

# 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

葉碧苓

## 摘要

村上直次郎是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的首任教授，南洋史學講座係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特色重點，日本其他帝國大學所無。村上精通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語文，長期從事日歐海外交涉史之研究，尤擅長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史、基督教史及日本人南洋發展史等課題。南洋史學講座共有13位畢業生，其中有4位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與十七世紀臺灣史有關的，他們都曾經受教於村上。

村上在近代臺灣歷史學的成就主要有三方面：（一）新港文書之命名與研究，新港是荷治時期西拉雅的一個社名，村上將這類凡是以羅馬字所寫的契約文書命名為新港文書，這些契約書的內容大致可分為買賣、典當、租佃三種類型；（二）臺灣總督府史料之編纂，其成果有《臺灣史料》稿本本編27冊、綱文25冊，《臺灣史料雜纂》7冊（包括《巴達維亞城日誌》3冊），合計59冊；（三）荷西時期臺灣史之研究與譯註。村上一生的學術成果極為豐富，對近代臺灣歷史學影響頗大。

關鍵詞：村上直次郎、臺灣史、南洋史、臺北帝國大學、新港文書。

## Murakami Naojirō's Study of Taiwan History

Pi-ling Yeh\*

### Abstract

Murakami Naojirō was the first professor teaching “History of Nanyang” in the Division of History,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here was no such kind of the History of Nanyang in any imperial universities in Japan, so the setting of the Division of History a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had a characteristic. He was proficient in many foreign languages such as Dut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diplomatic history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addition, he studied especially well the Taiwanese history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Japanese in Nanyang. There were thirteen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Nanyang, four of those topics of thesis were related to the Taiwanese history in the 17th centuries, and those who were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Murakami.

Murakami's achievements in the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include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naming and study of Sinkan Manuscripts. Sinkan was a tribe name of Siraya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Murakami named those lease contracts which were written in Roman as Sinkan Manuscripts. The contents of those contracts could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sale, pawn, tenancy. Second, editing the historic data of the Palace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 Its achievements include twenty seven volumes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Manuscript of Taiwan Historic Materials, twenty five volumes of the outline, seven volumes of the appendix(include three volumes of The Log of Batavia), fifty nine volumes in total. Third, the study and annotation of Taiwanese history during the Dutch and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extremely rich, and significantly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Keywords :** Murakami Naojirō , Taiwanese History, History of Nanyang,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Sinkan Manuscripts.

---

\*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

葉碧苓\*\*

## 壹、前言

對於研究臺灣史的學者而言，村上直次郎這個名字諒係耳熟能詳，因為他是重要史料「新港文書」的命名人，也是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的首任教授，對近代臺灣歷史學頗具影響。

自1874年日軍侵臺前後開始，日人即積極對臺灣展開實地調查、翻譯彙輯有關臺灣的中、西方文獻，尤其是西方文獻中較具實證價值的調查報告和論著；同時，臺灣研究亦隨之應運而生。<sup>1</sup> 日治初期，日本及臺灣當局即致力於臺灣文獻資料之徵集，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更是全力配合和協助，短短數年之間，已匯集相當可觀的中、日、西文臺灣資料。<sup>2</sup> 日治中期，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成立，臺灣史研究範圍擴大，並更講求實證。其中，村上直次郎是關鍵性人物。他自日治初期即參與總督府臺灣史調查、研究工作。擔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後，更逐漸開啟專題論文探討的風氣。

目前有關村上直次郎的研究仍然相當缺乏，僅有吳文星在國史館舉辦的「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中所發表的〈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一文，就村上在日治初期的臺灣史研究成果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村上過世後，其藏書、筆記、譯稿等，悉數寄贈上智大學。筆者雖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7年7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2月31日。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sup>1</sup> 詳閱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年），頁567-576。

<sup>2</sup>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年12月），頁1999-2028。

尚未到過上智大學詳閱此批資料，但有感於村上個人生平，及其對近代臺灣史研究的貢獻，至今仍無專文詳論之，因此筆者試撰此文，就教於學界先進。

## 貳、村上直次郎的生平與學術歷程

村上直次郎（1868.02.04-1966.09.17），於明治元年出生於豐後國（今之大分縣）玖珠郡森藩士之家。五歲起，隨叔父村上作夫（京都新聞創刊時之主筆）學漢學。<sup>3</sup> 京都同志社英學校、第一高等中學校（後來的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1892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就讀。三年後的1895年，也就是臺灣開始被日本殖民統治這一年，大學畢業，隨即進入大學院（研究所）就讀，接受坪井九馬三博士（1858-1936）及德籍史學家李斯博士（Ludwig Riess，1861-1928）的指導。<sup>4</sup> 李斯是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碩學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高足，他於1887年至1902年應聘至東京帝大文科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前後十六年間，參與東京帝大文科大學史學科之建立，指導史學會之創立，對日本近代歷史學有深刻的影響。他在東京帝大講授史學研究法和「萬國史（世界史）」，也發表了多篇日歐交涉史的研究論文，並建議東大當局將海牙古文書館等未刊之日蘭關係文書謄寫一份，以利研究。他的《臺灣島史》<sup>5</sup> 一書，大量徵引西方傳教士的報告、書信，以及荷蘭檔案，闡明許多過去所不知的史實，頗有創見，但因對某些漢文典籍解讀有誤，亦被認為缺失不少。不過村上日後研究臺灣史時，特別重視荷蘭檔案、傳教士報

<sup>3</sup> 岩生成一等：〈先學を語る 村上直次郎博士〉，《東方學》，第57輯（1979年1月），頁152。

<sup>4</sup> 〈村上直次郎（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第21號文書（1928年3月27日）；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上智史學》，No.13（1968年10月），頁3-6。

<sup>5</sup> Ludwig Riess,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東京：富三房，1898年）。

告、書信等史料，當是受到李斯博士不少的啟發。<sup>6</sup> 坪井九馬三博士在東大開設日歐交涉史講座，日歐交涉史之研究必需通曉多國外語，村上的英語能力在同志社英學校（每週英語課大約18堂，不同老師教授，使用不同教材），一高時代，就已經是同輩間的佼佼者。在坪井的指導下，以其原有的英語能力為基礎，延伸學習德、法，以及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拉丁等語言，奠定日後譯注、研究之能力。<sup>7</sup> 村上曾勉勵學生佐藤直助等人，自己能學會這麼多種語言，並非因為自己是「語言天才」，而是非常努力學習的結果。<sup>8</sup>

1896年5月22日，村上還是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生時，就被拓殖務省聘為囑託從事臺灣史的調查研究工作。9月29日，村上接到「出張令」，隨即在10月4日出發，翌年3月31日完成調查工作，歷時約半年。<sup>9</sup> 渡臺之前，他先到熊本調查柏原平八郎所藏的《異國高砂》古文書；再轉往長崎、平戶、大村等地，蒐集鄭成功、濱田彌兵衛等之事蹟，以及當時臺、日外交往來的資料，獲得頗具價值的基督教古文書。11月初抵臺後，巡迴西部各地從事調查工作。對日本人往昔渡航臺灣的遺跡，鄭成功之事蹟徵信等特別著力。1897年1月初，在臺南附近的新港社發現以荷蘭文字拼寫之蕃語土地契約書，這種「蕃語羅馬字」在荷蘭人退出臺灣後曾長期為當地的西拉雅族人使用，其內容有助於瞭解當時的經濟狀況。村上認為若能以漢蕃雙語對譯的「蕃仔契」為基準，進行解讀，將對語言學有所助益，並有助於解釋臺灣的人種問題。因此，村上將其發現的「蕃仔契」圖版交

<sup>6</sup> 有關Ludwig Riess博士及其所著之《臺灣島史》之評價，可參考むな生：〈梗概及評論：臺灣島史〉，《史學雜誌》，8：6（1897年6月），頁602-604。〈彙報：臺灣島史之行衛〉，《史學雜誌》，11：1（1900年1月），頁98-99。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頁2020-2021。

<sup>7</sup>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3（東京：平凡社，1975年5月），頁435。

<sup>8</sup> 岩生成一等：〈先學を語る 村上直次郎博士〉，頁153。

<sup>9</sup> 〈村上直次郎（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第21號文書（1928年3月27日）；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頁3-6。

由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的囑託語言學專家小川尚義（1869-1947），<sup>10</sup> 著手進行此一研究。村上將此種新發現的蕃語羅馬字土地契約書命名為「新港文書」，並將其初步研究的成果發表在《史學雜誌》上。<sup>11</sup> 2月底離臺後，村上轉往廈門、福州、香港、廣州、上海等地，蒐集有關臺灣的中、西文書籍，3月底返回日本。<sup>12</sup> 1897年7月，村上自東京帝大大學院退學。1898年1月4日，總督府再度聘村上為臺灣歷史編纂事務囑託，每月薪俸80圓，1月12日出發前往臺灣南部及鹿兒島、沖繩二縣出差，蒐集有關臺灣之史料。迨其任務完成後，隨即於6月28日解除囑託職務。<sup>13</sup>

1899年5月26日，日本文部省命村上前往西班牙、義大利、荷蘭留學三年，進行南洋語學及地理歷史學之相關研究，留學期間每年支領

<sup>10</sup> 小川尚義，189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科。由於小川本身對馬來語、臺灣語研究有興趣，加上東大指導教授上田萬年（1867-1937）的勸勉，並將之介紹認識伊澤修二（1851-1917），於是小川自東京帝大一畢業隨即來臺任職於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囑託，1899年任國語學校教授，1901年任總督府編修官，1911年升任學務部編修課長。1916年，赴中國、印度支那、印度及南洋諸島一年，考察研究印度支那語、馬來波里尼西亞語。1918年6月，任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翻譯官，兼高等商業學教授，講授民族學、語言學課程，期間曾赴印度考察。1924年，任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兼任總督府圖書編修課長。1928年3月，轉任臺北帝大講師。1930年3月，臺北帝大增設言語學講座，由小川尚義升任講座教授。1936年，自臺北帝大退休，結束四十年在臺的生活，遺缺由淺井惠倫接替。〈小川尚義（任臺北帝大教授；俸給；勤務）〉，《昭和5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9冊，第73號文書（1930年3月27日）。〈小川尚義（三級俸下賜；賞與；依願免本官）〉，《昭和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5冊，第110號文書（1936年3月1日）。馬淵東一：〈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馬淵東一著作集》，第3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1974年），頁485-500。

<sup>11</sup> 村上直次郎此次發現的「新港文書」，合計41通，其中有8通附有漢文翻譯。以年代區別，雍正年間1通、乾隆年間35通、嘉慶年間5通。詳閱村上直次郎：〈臺灣新港社文書〉，《史學雜誌》，8：7（1897年7月），頁674-683。

<sup>12</sup> 〈彙報：村上直次郎氏の臺灣及南支那旅行〉，《史學雜誌》，8：4（1897年4月），頁387-388。並參考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頁2003-2005。

<sup>13</sup> 〈歷史編纂事務囑託村上直次郎用濟二付囑託ヲ解ク〉，《明治3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進退追加第341冊，第51號文書（1898年6月25日）。並參考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頁2005。

1,740圓的獎學金。1900年7月，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繼續在外國研究，1902年底歸國。翌年1月起，兼任東京帝大史料編纂員及文科大學講師，並分擔國史第一講座職務。1904年8月底，解除分擔國史第一講座之職務。1908年7月底，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校長，兼史料編纂官。1918年9月，改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校長，兼史料編纂官及東京帝大講師。1921年6月，以論文題目〈十七世紀日本致力於與墨西哥展開貿易的努力（第十七世紀に於てメキシコと貿易を開く爲日本のなしし努力）〉獲得文部省頒授文學博士學位。<sup>14</sup>

1922年4月，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爲了宣示臺灣治政進入新的階段，並宣揚日本在臺之統治史蹟，遂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希望以三年時間蒐集、編纂臺灣統治二十五年（1895-1919）之史料，並撰成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爲主的「新臺灣史」。<sup>15</sup> 委員會之主要成員，有持地六三郎（1867-1923，部長）、田原禎次郎（1868-1923，主查）、尾崎秀眞（1874-1949，委員）三人。<sup>16</sup> 翌年4月底與8月中，田原、持地相繼罹病去世，<sup>17</sup> 迫使總督府另外聘請木村增太郎、隈本繁吉、

<sup>14</sup> 〈村上直次郎（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第21號文書（1928年3月27日）；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頁3-6。

<sup>15</sup> 〈時報：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の創設〉，《臺灣時報》，第35號（1922年6月），頁3-4。

<sup>16</sup> 〈持地六三郎（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第1號文書（1922年5月2日）。〈持地六三郎（府史編纂委員會部長ヲ命ス）〉，《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第7號文書（1922年5月18日）。〈田原禎次郎（社會事業調查及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第2號文書（1922年5月3日）。〈尾崎秀眞（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第3號文書（1922年5月5日）。〈時報：史料編纂會議〉，《臺灣時報》，第37號（1922年8月），頁2。

<sup>17</sup> 〈田原禎次郎氏永眠〉，《臺灣日日新報》，第8240號（十五），1923年5月2日。〈田原禎次郎（賞與；危篤）〉，《大正12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750冊，第51號文書（1923年5月3日）。〈持地氏逝く〉，《臺灣日日新報》，第8247號（五），1923年8月17日。〈持地六三郎（賞與；危篤）〉，《大正12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752冊，第65號文書（1923年8月20日）。

村上直次郎等囑託參與此次的修史事業。於是，7月28日，村上被聘為史料編纂事務囑託，主要負責蒐集、調查荷蘭領臺時期事蹟。<sup>18</sup> 為此，該年底，村上再次來臺灣中南部視察，1924年1月9日返回東京。<sup>19</sup> 三年的修史事業在田原、持地過世後人員雖有適時的補充，但因新任總督伊澤多喜男配合加藤高明內閣的政策，在臺灣進行行政改革，總督府編制大幅縮小，因而使得編纂委員會實際運作停頓了，「新臺灣史」的修史事業遂告中斷。為此，主要成員之一的尾崎秀真，感嘆此「實為日本學界之恥辱」。<sup>20</sup>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村上直次郎獲聘為史學科教授。<sup>21</sup> 4月17日，總督府命其為在外研究員，前往荷蘭、英、西班牙、葡萄牙四國及蘭領爪哇考察。<sup>22</sup> 翌年2月抵臺，擔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南洋史學講座係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特色重點，日本其他帝國大學所無。村上精通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語文，長期從事日歐海外交涉史之研究，尤擅長於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史、基督教史及日本人南洋發展史等課題，以其學經歷擔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可謂實至名歸。

1929年4月26日，第十二任總督川村竹治認為史料編纂事業有其必要性，遂公布訓令第29號，決定再花三年時間，以「完璧之陣容」，讓「臺灣府史」的編纂事業復活。<sup>23</sup> 此堅強陣容的首腦人物，即是村上直次

<sup>18</sup> 〈村上直次郎（府史料編纂二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大正12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752冊，第38號文書（1923年7月28日）。

<sup>19</sup> 〈雜報：人事消息〉，《臺灣時報》，第53號（1924年2月），頁163。

<sup>20</sup> 尾崎秀真：〈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一）〉，《臺灣時報》，第65號（1925年3月），頁68。檜山幸夫：〈解說〉，《臺灣史料綱文》，下卷（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史料研究會，1989年3月），頁387-394。

<sup>21</sup> 〈村上直次郎（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第21號文書（1928年3月27日）；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頁3-6。

<sup>22</sup> 〈村上直次郎（自今内地滞在中加俸本俸ノ十分ノ三ヲ給ス）〉，《昭和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1冊，第57號文書（1928年5月17日）。

<sup>23</sup> 〈復活に決した『臺灣府史』の編纂〉，《臺灣日日新報》，第10423號（七），1929年4月26日。



郎（部長）。<sup>24</sup> 編纂員有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久保得二、助教授神田喜一郎，以及臺北高等學校教授波多野清太郎。<sup>25</sup> 此外，尚有專家猪口安喜、尾崎秀真、鹽見平之助等囑託參與。此次的編纂委員會不再以「修史」為目標，改以類似《大日本史料》的編年史體裁，編纂所謂的《臺灣史料》。

同年5月，臺北帝國大學首任文政學部部長藤田豐八（1869-1929），返回東京治療腎臟病，不幸於7月15日逝世。<sup>26</sup> 8月23日，由村上遞補藤田文政學部部長遺缺。<sup>27</sup> 1932年6月，村上又兼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遂以職務繁忙為由，辭去文政學部部長，遺缺由安藤正次接任。<sup>28</sup> 1934年暑假，村上為了蒐集南洋史學相關資料，帶著學生中村孝志前往巴達維亞城（今之雅加達）地方檔案館（Land's Archief te Batavia）抄錄史料。後來，中村曾將此次發現的幾件臺灣土著民的戶口表，以及1659年的臺灣傳教巡視報告等檔案翻譯發表。<sup>29</sup> 兩人回程途經澳門，順道調查日葡關係史料。<sup>30</sup> 1935年9月底，村上以身體違和、家中有事為由，辭

<sup>24</sup> 〈村上直次郎（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部長ヲ命ス）〉，《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6冊，第50號文書（1929年4月26日）。

<sup>25</sup> 〈久保得二（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員ヲ命ス）〉，《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221冊，第57號文書（1929年4月30日）。〈神田喜一郎（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員ヲ命ス）〉，《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6冊，第59號文書（1929年5月7日）。〈波多野清太郎（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員ヲ命ス）〉，《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6冊，第104號文書（1929年6月3日）。

<sup>26</sup> 〈藤田豐八（賞與；危篤）〉，《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7冊，第17號文書（1929年7月15日）。加藤繁、松田壽南：〈彙報：藤田博士逝く〉，《史學雜誌》，40：4（1929年8月），頁119-125。

<sup>27</sup> 〈村上直次郎（補文政學部長；職務俸）〉，《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7冊，第92號文書（1929年8月23日）。

<sup>28</sup> 〈村上直次郎（解補文政學部長講座分擔職務俸二百 下賜）〉，《昭和7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70冊，第128號文書（1932年6月27日）。

<sup>29</sup> 參考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望〉，《臺灣風物》，28：1（1978年3月），頁20。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頁299。

<sup>30</sup> 〈彙報〉，《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2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35年），頁423。

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職務，10月8日搭船離臺，遺缺由副教授岩生成一（1900-1988）<sup>31</sup> 接替。<sup>32</sup>

村上直次郎回到日本後，兩年沒有任何新職務，專心於西文書籍之翻譯。1937年4月，才又擔任文部省臨時圖書局事務及臨時教科書審查會囑託，負責第四期國編本教科書審查業務。1940年上智大學創校，村

<sup>31</sup> 岩生成一，1900年生於福岡縣小倉市。1925年3月，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科畢業，畢業論文題目〈江戸時代鎖國前後の日支貿易〉。4月，隨即任東大史料編纂官補，在村上的指導下負責《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歐文材料」的編纂工作。1927年7月，赴中國、香港、法領印度支那（越南）、暹羅（泰國）及蘭領東印度（印尼）考察三個月。1929年11月，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1930年2月，奉命任「在外研究員」，前往荷、英兩國及蘭領東印度留學考察一年十個月，後又再赴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國，遂延至1932年5月底始返回臺灣。1935年，村上回日本後，職務由岩生成一接替。惟要到翌年3月，岩生才正式改聘為教授，正式擔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1939年8月，岩生為蒐集南洋史學暨華僑關係資料，再度前往蘭印爪哇島進行調查研究。此次的調查成果成為臺北帝大開學紀念展覽會、歷史展覽會及校外人士蒞校參觀時，對外展示的重要展品。岩生的專長是南洋日本町、日本人活動的研究，擅長以荷、西語之東南亞文獻史料，從事十七世紀日本人移民南洋活動之研究。在臺期間，曾先後發表〈バタビヤ（巴達維雅，今印尼雅加達）移住日本人の活動〉、〈洗禮簿を通じて見たるバタビヤ（巴達維雅）の日本人〉、〈モルツカ（摩鹿加）諸島移住日本人の活動〉、〈媽港（Macau，澳門）ゼスス（基督教）會コレジオ（神學校）に於ける日本人〉等多篇論文。1941年4月，以其著作《南洋日本町の研究》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賞。1946年底返回日本時，將其研究草稿及海外蒐集之相關史料帶回日本，持續從事日本人南洋移民活動史之相關研究，繼而完成《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一書。金井圓：〈岩生成一先生を偲ぶ〉，《史學雜誌》，97：6（1988年6月），頁1123-1124。〈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大助教授；俸給；勤務）〉，《昭和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58冊，第40號文書（1929年11月1日）。〈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大教授；敘高等官五等；本俸十二級俸下賜；文政學部勤務ヲ命ス；南洋史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九百九十圓下賜）〉，《昭和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5冊，第134號文書（1936年3月11日）。〈彙報〉，《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6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40年），頁267-268。岩生成一：《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頁476-486。

<sup>32</sup> 〈村上直次郎（年功加俸六百圓下賜；退官；賞與）〉，《昭和10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3冊，第123號文書（1935年9月26日）。〈彙報：村上教授勇退〉，《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36年），頁376。

上任教授兼文學部部長。1942年，上智大學設立史學科，其特色為設有「吉利支丹（Kirishitan，西班牙、葡萄牙為中心之天主教系統）」研究會、文庫，並定期出版研究論輯。村上本人有Evora版的「Jesus會士日本通信」及「Jesus會日本年報」之譯注，<sup>33</sup> 因此上智大學能以吉利支丹研究為其史學科重點發展。1943年，村上榮任帝國學士院會員（終身榮譽）。二次大戰結束後至1953年，擔任上智大學總長。1959年，辭去上智大學教授職務。1966年9月，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於家中。<sup>34</sup>

### 叁、擔任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教授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初設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根據同年2月頒布之「文政學部規程」，文政學部分為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及政學科。臺北帝國大學自設校以來，即以其位於日本帝國的南方邊陲，配合南進政策之推動，致力於華南、南洋地區自然和人文的研究與開發。其中，文政學部史學科設有東洋史學、國史學及南洋史學三個專攻講座，還設置了輔助學科性質的土俗人種學、西洋史學及史學地理學講座。南洋史學和土俗人種學講座係大學創設時特別設立之講座，乃史學科的重點特色，就讀學生亦以攻讀南洋史學者最多，歷年畢業生中，臺籍學生僅有柯設偕（馬偕外孫）和張樑標二人。<sup>35</sup>

日本舊制大學是採講座制，亦即一講座為教授1名、助教授1名，助手1至3名，擔任講座的教授被要求「明確化專攻責任」。戰前日本國內的七所帝國大學的史學科都是設國史、東洋史、西洋史三個專攻講座，

<sup>33</sup> 村上直次郎譯、柳谷武夫編：《イエズス會士日本通信》，上、下（東京：雄松堂，1969年）。村上直次郎譯、柳谷武夫編：《イエズス會日本年報》，上、下（東京：雄松堂，1969年）。

<sup>34</sup> 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上智史學》，頁3-6。

<sup>35</sup> 林秀美：〈臺北帝國大學之創設〉，《臺北帝大的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年），頁64-65。

唯獨臺北帝國大學改西洋史為南洋史。<sup>36</sup>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山洋史學講座教授，係由東京帝國大學出身的文學博士村上直次郎擔任。1928年4月，村上直次郎在接到總督府聘書後，隨即被派往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四國及蘭領爪哇考察將近一年的時間。當時他的身分是「在外研究員」，可以加領本俸的十分之三作為購入研究上或學生指導上必要的圖書設備，如有特殊需求還可以另外提出經費申請。<sup>37</sup> 村上擅長以荷、西史料研究臺灣史、南洋史，以及日本與南洋關係史、天主教史等。除了南洋史課程外，也負責教授一年級生史學概論課程。1930年，史學科增設西洋史學、地理學講座，由村上兼任講座教授，直到1935年他辭去臺北帝大教授職務，西洋史學、地理學講座職務才由助教授菅原憲接任。總計村上在臺北帝國大學服務了八年時間，以下是村上在臺北帝大曾經開設的課程名稱：（括號內數字為單位數，相當於學分數。）

- 一九二九年 南洋史概說（2）
  - 日本洋學史及び和蘭語（4）
- 一九三〇年 史學概論（1）
  - 南洋史概說（2）
  - 西班牙語（2）（選修）
  - 和蘭語（1）（選修）
- 一九三一年 史學概論（2）
  - 日本と南洋との歴史的關係（2）
  - 南洋史講讀（2）
  - 和蘭語（1）（選修）
  - 和蘭語初步（1）（選修）
  - 西洋史概說（1）
- 一九三二年 史學概論（2）
  - 南洋史概說（2）

<sup>36</sup> 同樣地，另一所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則是以朝鮮史學取代西洋史學。參考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一覽》（京城：該校，1942年），頁74-75。

<sup>37</sup> 松本巍著、崩通林譯：《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臺北：崩通林，1960年）頁7-8。

-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2）（Compendio de la Historia Universal）  
 西班牙語初步（1）（選修）  
 一九三三年 史學概論（2）  
 歐洲人の南洋發展（2）  
 南洋史講讀及び演習（2）（Alvarez:Formosa Geographica de Historicamente Considerada）  
 一九三四年 史學概論（2）  
 南洋史概説（4）  
 南洋史講讀（2）（J. Montersy Vidal:Historia de Filipinas）  
 西班牙語初步（2）（New First Spanish Book）  
 一九三五年 南洋史概説（2）（第一學期）  
 南洋史特殊講義（2）（十七世紀臺灣史）<sup>38</sup>

此外，本講座另有助教授岩生成一、講師箭内健次（1910-）。<sup>39</sup>

<sup>38</sup> 〈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第1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34年），頁451-454。〈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第2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35年），頁421。〈彙報〉，《史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36年），頁374。

<sup>39</sup> 箭内健次生於福島縣西白河郡，為日本蒙古史專家箭内互（1875-1926）之次子，1934年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科畢業，畢業論文〈近世初頭に於ける日本とイスパニア（西班牙）との關係〉，之後隨即進入大學院就讀，期間曾發表關於「日西交涉斷絶」的研究論著，不同於向來從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確立的角度，而以日本商船在南洋通商貿易受歐洲人打壓來解釋日本鎖國政策之實施，展露其南洋史研究實力。箭内專長以西班牙文獻進行菲律賓史的相關研究，曾發表〈基督教史上の一發見〉、〈初期英國東印度會社の對日本通商計畫〉、〈シーボルト（Siebold）作製の地圖について〉、〈シーボルト（Siebold）に提供せし門人洽文の研究〉、〈シーボルト（Siebold）原稿解説〉等諸文，並於大日本史系列中負責撰寫〈近世の外交〉一文。〈彙報：國史大學院例會〉，《史學雜誌》，47：8（1936年8月），頁1032-1033。〈箭内健次（任臺北帝大助教授；七等十二級；文政學部勤務；職務俸三百六十圓）〉，《昭和13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93冊，第182號文書（1938年5月27日）。箭内健次：〈近世の外交〉，《新講大日本史第9卷：日本外交史》（東京：雄山閣，1941年）。

1935年，村上回日本後，其南洋史學講座職務由岩生成一接替。惟要到翌年3月，岩生才升任為教授，正式擔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sup>40</sup>1936年11月，史學科再增聘箭內健次為講師；1938年5月，改聘為助教授。

進入南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有：南洋史概說、南洋史特殊講義、南洋史講讀及演習共5單位，土俗學、人種學1單位，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各3單位，其他學科內選修4單位，共19單位。（1931年起，改為史學概論、國史概說、東洋史概說、南洋史概說、西洋史、地理學、土俗學、人種學等共通必修科目各1單位，南洋史特殊講義、南洋史講讀及演習共4單位，國史、東洋史各2單位，其他學科內選修5單位，共20單位。）另外，依據「文政學部規程」規定，除了必修科目之外，尚必須在英語、德語、法語中擇一修習2年。由於入學的學生在高等學校時，大多已經學過英語和德語，所以進入大學後外語的選修主要是以法語為主。此外，南洋史專攻的學生尚須接受西班牙文及荷蘭文的訓練。根據中村孝志的回憶，當時南洋史學講座的學生是很忙碌的，因為有「歐洲語言學大師」之稱的村上教授對語言的要求是很嚴格的：

要研究殖民地時代的東南亞史，至少必須要修習幾種語言。

我們在高等學校時就修了英語和德語，在文政學部兩年的法語是必修的，更進一步被要求要修習西班牙語及荷蘭語。因為大學三年就要寫畢業論文，最遲在大學二年級後半階段就不能不具有相當程度的語學基礎。因為村上老師是歐洲語言學大師，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的後半階段開始利用午休的時間，接受課外的（例如像西班牙語）速成訓練。到二年級時用這樣的西班牙語開始講讀史籍。在此同時，學生被要求修習新的荷蘭語課程。大體隔年西班牙

<sup>40</sup> 〈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大教授；敘高等官五等；本俸十二級俸下賜；文政學部勤務ヲ命ス；南洋史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九百九十圓下賜）〉，《昭和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085冊，第134號文書（1936年3月11日）。

牙語和荷蘭語交替作為主修，一般說來前者的學生以菲律賓、後者的學生以關於荷治東印度關係的題目作為主修來寫畢業論文。<sup>41</sup>

當時臺北帝國大學修業年限是三年，但是南洋史的學生必需花較多的時間在學習新的語言，很難三年順利畢業，學生花費四年乃至五年才畢業的人，大約占一半。在村上、岩生、箭內的指導下，南洋史學講座共有13位畢業生，其中有4位的題目是與十七世紀臺灣史有關，他們都是曾經受教於村上的：

- (一) 1930-1933年，山村光敏：〈有關十七世紀經由臺灣之南洋貿易（十七世紀に於ける臺灣經由の南洋貿易）〉。
- (二) 1931-1935年，速水家彥：〈鄭成功之臺灣攻略與其後之對荷蘭人的交涉（鄭成功の臺灣攻略と其後の對和蘭人交渉）〉。
- (三) 1932-1935年，中村孝志：〈有關西、蘭兩國人在臺灣的教化事業（臺灣に於ける西、蘭兩國人の教化事業）〉。
- (四) 1933-1937年，齋藤悌亮：〈鄭成功之臺灣攻略（鄭成功の臺灣攻略）〉。<sup>42</sup>

除此之外，東洋史學、國史學專攻的學生也有幾位是以臺灣史、南洋史有關的主題作為畢業論文。例如，馬偕的外孫柯設偕1928-1931年東洋史學專攻，畢業論文〈「臺灣」之名稱的歷史與地理的考察及古代漢民族有關「臺灣」之知識的變遷（臺灣の名稱の歴史的並に地理的考察及び古代漢民族の臺灣に關する知識の變遷）〉。1932-1935年東洋史學專攻的畢業生原徹郎，畢業論文〈有關十六、七世紀中國與菲律賓的關係（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支那と比律賓の關係）〉，也是在村上的指導下

<sup>41</sup>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頁178。

<sup>42</sup> 參考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頁85-89。

完成的。<sup>43</sup> 畢業後，柯設偕回母校淡水中學任教；原徹郎進入「東亞研究所」，東南亞史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

在正式課程之餘，史學科的學生還必需參加「歷史讀書會」，此學會採不定期集會方式，由學生或老師提出研究主題之發表討論。村上曾在會中發表過2次，分別是：

第18回，1932年9月25日，於基隆社寮島，「村上教授指導基隆社寮島之史蹟考察—紅毛城址並蕃字洞」。

第21回，1932年11月12日，「有關澎湖島的紅毛城址」。<sup>44</sup>

1935年7月15日至25日，臺北帝國大學舉辦「夏期講習會」，村上擔任「日本國民南洋發展の事蹟」之課程，這也是他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最後的講課。<sup>45</sup>

## 肆、臺灣史研究業績

1918年，日本敕令第388號「大學令」第一條：「大學之目的，是教授並研究國家需要之學術理論及應用，並兼顧人格之陶冶與國家思想之涵養。」這樣理念的具體化，在臺北帝國大學之設立。臺北帝國大學創校校長幣原坦從臺灣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著眼，闡明臺灣的學術價值，宣示即將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將扮演協助日本帝國南進之政策大學的角色。<sup>46</sup> 爲了臺灣及南支、南洋之歷史，臺北帝國大學設立了南洋史學講座，因此講座的擔當教授必須集中心力於「專攻一科—南洋史學」，也就是村上直次郎必須在已有侷限的南洋史專業領域中從事學問與研究工作，這包括對學生

<sup>43</sup> 西村朝日太郎：〈學界のヨブ・馬淵東一外傳〉，《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 社會人類學の諸問題》（東京：地一書房，1986年），頁486。

<sup>44</sup> 〈彙報〉，《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1輯（東京：巖松堂書店，1934年），頁457-459。臺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66號（1932年9月30日），頁1。

<sup>45</sup> 臺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130號（1935年6月30日），頁3。

<sup>46</sup>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第53號（1923年12月），頁25-34。



的授課及研究指導，也包括其自身之學術研究。惟村上一生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以臺灣為中心之相關研究業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茲列舉「新港文書之命名與研究」、「臺灣總督府史料之編纂」、「與臺灣有關之研究與譯注」三項成果說明之：

## 一、新港文書之命名與研究

臺灣的南島民族至少有二十多種語言，大約有一半已經消失，有的已經瀕臨滅絕的邊緣，只剩極少數老年人還能講。自古以來，各種南島語言都沒有什麼文字記錄，直到荷治時期（1624-1662）荷蘭傳教士來臺灣以後，才開始教臺南一帶的西拉雅（Siraya）人和彰化、雲林一帶的法佛朗（Favorlang）人以羅馬字母拼寫他們的母語。因此，這兩種平埔族語言便成為臺灣最早有文字記錄的語言，留下非常珍貴的平埔族語言資料。其中，西拉雅語的文獻資料稍微豐富一些，包括三種：1. 聖經馬太福音整本的西拉雅語翻譯，2. 西拉雅語的基督教義問答，3. 新港文書。<sup>47</sup>

「新港文書」，俗稱「蕃仔契」，是一種土地租借契約。從目前文獻可知，最早是1871年由美國駐廈臺領事李仙得（C. W. Le Gendre）撰文報告馬雅各牧師（Dr. Maxwell）在高雄縣內門鄉木柵（Baksa）發現數通蕃語文書，而他本人只看到其中1通。<sup>48</sup> 1873-1874年，美國密西根大學生物學者Joseph Beal Steere來臺調查時，曾經在臺南及高雄附近以槍枝向頭目換得雍、乾、嘉年間的蕃語文書21通。與Steere一起遊歷調查的傳教士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也找到雍、乾年間的蕃語文書9通，送給英國駐中國領事館員E. Colborn Baber。1886年，Baber將之轉送給

<sup>47</sup> 李壬癸：〈一百年來平埔族語言消失的歷程〉，《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42-62。

<sup>48</sup> 參考吳國聖、翁佳音：〈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建構西拉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2005年12月），頁70。

英國皇家亞細亞協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因而引起歐美學界的注意。<sup>49</sup> 1897年初，村上直次郎在臺南附近的新港（今臺南縣新市鄉）又發現41通蕃語文書，遂以「新港」之名，將這類蕃語文書命名為「新港文書」。新港是荷治時期西拉雅的一個社名，村上將這類凡是以羅馬字所寫的契約文書都通稱命名為「新港文書」，此後遂成學界慣例。但除了新港社之外，包括臺南西拉雅的麻豆、卓猴、大武壠、灣里，以及屏東馬卡道的茄藤、下淡水等社，也曾經使用過這類「蕃仔契」，不過新港社的數目最多。「新港文書」的形式有三種：1.只用西拉雅單種語文書寫，2.同時用西拉雅和漢文兩種文字，3.只用漢文書寫。從南島語言學研究的角度，第一、二種比第三種有價值，而第一種（單語）比第二種（雙語，蕃漢合字）的解讀難度高得多。而向來對「新港文書」的研究都是從雙語文書的解譯中累積得來的，村上曾經樂觀的將雙語文書比喻為拿破崙時代所發現的「羅塞塔石碑」，為解開已成死語的西拉雅語的關鍵。<sup>50</sup>

1897年初，村上在英國傳教士巴克禮牧師（Rev. Tothomas Barclay）、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的幫助下首批發現的新港文書，合計有41通，其中8通附有漢文對譯。其後三十餘年，他及小川尚義、Y. Ino等人又不斷地蒐羅、研究，最後村上在1933年發表《新港文書》<sup>51</sup>一書。書中收錄了87件新港社文書（單語66件、雙語21件），並附錄其

<sup>49</sup> 村上直次郎：〈臺灣蕃語文書〉，《臺灣文化史說》（臺南：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會，1930年），頁122。

<sup>50</sup> 羅塞塔石碑是一塊製作於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塊刻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詔書的石碑。但是，由於這塊石碑同時刻有同一段文字的三種不同語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羅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時由法軍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維耶·布夏賀（Pierre-François Xavier Bouchard）在一個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Rosetta，今日稱為el-Rashid）發現，但在英法兩國的戰爭之中輾轉到英國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中並公開展示。村上直次郎：〈臺灣蕃語文書〉，《臺灣文化史說》，頁124。

<sup>51</sup> Naojirō Murakami, Sinkan Manuscripts,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I, No. 1 (Formosa: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1933).

他廣義西拉雅語言及可能的其他語言村社文書14件（卓猴社3件、麻豆社6件、大武壠社1件、下淡水社1件、茄藤社1件），總計101件，年代最早的一件是康熙2（1663）年，最晚的是嘉慶18（1813）年。事實上，村上出書時，實際已知的「蕃仔契」有141件。後來，小川尙義、國分直一（1908-2006）、王世慶等人又陸續發現或收藏10多件。<sup>52</sup> 根據村上的研究，這些契約書的內容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1.買賣契約：賣契、絕賣契、杜賣契，這類的數量最多；2.典當契約：典契、胎借契；3.租佃：墾契、贖批約。可以看出西拉雅人一直和漢人從事田地的買賣、典當、租佃的交易，顯示他們已經進入貨幣經濟和商品化生產的農村社會體制。

荷蘭人在1624年占據臺灣後，在大員（Tayouan，今之安平）附近設立教會、學校，爲了教化平埔族，遂以羅馬字書寫西拉雅語與荷蘭文聖經對譯作爲教材，教導各社年輕學童。據乾隆、道光年間之府縣志記載：習得「紅毛字」者，號曰「教冊」，負責掌管出入之數。書寫這種文字時不用毛筆，而是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管醮，由左而右書寫。而最有趣的是文書中關於阿拉伯數字的用法，三十八以308表記，十二以102表記，二百十二以200102表記。<sup>53</sup> 根據李壬癸的統計，這種荷蘭文羅馬字拼寫的「新港文書」，存世總數不到200件。荷蘭人於1662年就被鄭成功驅逐出臺灣，而最後一件「新港文書」卻寫於嘉慶23（1818）年，可見在荷蘭人離開臺灣一個半世紀後的十九世紀初還有西拉雅人會說母語。然而，到了1873年Steere在臺灣南部蒐集資料時，已經沒有人能講西拉雅語了；他們雖珍藏著一些「新港文書」，卻沒人懂得。當時，Steere僅在崗仔林附近從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婦收錄到100多個單詞，但沒有收到任何句子。老婦表示即使在她父母在世時，他們都很少使用西拉雅語了。據此推斷，西拉雅語大約在1830年左右就已成爲死語了。<sup>54</sup> 這顯示清朝領有臺灣後，西

<sup>52</sup> 翁佳音：〈一件單語新港文書的試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9年），頁143-152。

<sup>53</sup> 村上直次郎：《臺灣新港社文書》，頁674-683。

<sup>54</sup> 李壬癸：〈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臺灣史研究》，9：2（2002年12月），頁1-68。

拉雅族人快速漢化，才會讓其母語在很短時間內消失無存。

## 二、臺灣總督府史料之編纂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係田健治郎總督於1922年4月1日，以訓令第101號「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成立。由總務長官擔任委員長，其下分庶務部和編纂部，由史料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負責史料調查、編纂之一切相關事務，另有編纂委員田原禎次郎、尾崎秀真，以及囑託數名。「臺灣總督府史料」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臺灣總督府統治臺灣時期有關的全部史料，這就是後來完成的《臺灣史料》稿本；第二部分是根據臺灣總督府所藏的史料編纂而成的《臺灣史料雜纂》，《巴達維亞城日誌》就是屬於這一類。<sup>55</sup> 7月24日，委員會正式運作，會中編纂部長持地揭示了工作宗旨、具體內容和原則，以及編纂的體裁：

本會設置之理由也，領臺以來，已閱二十有七年，經過一世紀四分之一，尚未有統治史蹟之完全編纂。若長此放擲，則不惟關係文書湮滅，且領臺以來，與本府有關係之人，或離去、或死亡。如此則文書未現之活材料，永無可發表於社會之機會，恐有空歸湮滅之虞。即於此際，編纂完全之總督史，最為要緊之事。故自大正11年度起，至13年，為三年繼續事業，擬將本事業完成。本史編纂之宗旨、內容，及程度，即於以上理由，可謂指示限定矣。其調查方法如左（下）：

- （一）關於臺灣官、公、私既刊未刊著作物之蒐集。
- （二）關於臺灣外國著作物（中、英、法、德、蘭、西）等之蒐集。
- （三）針對官府保存之文書記錄，拔萃必要之史料。
- （四）針對當時當局可信人士，進行調查訪問。
- （五）蒐集本史料可用之文書、照相。（下略）

關於編纂修史之體裁應如何？編纂者頗費考慮也。查從來支

<sup>55</sup> 檜山幸夫：〈解說〉，《臺灣史料綱文》，下卷，頁330-333。

那式之府史，專以官府行動之進退盛衰紀事為主，記載政治上、經濟上、民生休戚之消長興廢者鮮矣，如斯，則不可為現代修史之範例；若以西洋式之史論體、文史體，私人之著述法則，官方之述作不適宜。故本史，參酌、折衷支那式之府史，西洋式各種著書之體裁，亦鑑及本事業之宗旨、內容、程度而制宜，製成本史之目錄草稿焉。（下略）

本史之主旨，在乎編述日本之臺灣統治史蹟，雖本紀、志類相俟，而圖存史實。然而不記改隸以前之史實，則無由知其前後之關係。故於前紀略敘臺灣開闢以來沿革大要，欲使日本與臺灣過去之關係，一目了然。（下略）

最後尚有一言，本事業之副產物，意欲製作臺灣圖書總目錄暨臺灣圖書解題。此外，各方面所蒐集史料應予甄別、選擇、分類、整理以為保存。（下略）<sup>56</sup>

據此，持地揭示「新臺灣史之目錄草稿」，共分五卷：第一卷「前紀」，內容涵蓋臺灣地理、日本領有前之歷史概略、日本與臺灣關係；第二卷「本紀一」，前半部記錄樺山資記、桂太郎、乃木希典總督時代之重要事蹟，後半部記錄兒玉源太郎總督時代；第三卷「本紀二」，前半部記錄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總督時代之重要事蹟，後半部記錄田健治郎總督時代，前三卷之末並附有重要紀事年表；第四、五卷為「志類一、二」，其後有附錄圖表。<sup>57</sup>

由上可知，史料編纂委員會初期之目標高遠，但部長持地本人長期身在東京，實際在臺工作者只有田原、尾崎二人，要在規劃三年期限內完成，本來就是困難度極高的工作。孰料，一年後，田原、持地相繼去世。總督府於是再增聘木村增太郎（負責臺灣金融、南支南洋貿易相關史料編纂）、隈本繁吉（接替田原之職位）、村上直次郎（負責臺灣古代史之編纂）等人擔任囑託。村上在日治初期便有調查臺灣史料的經驗，之後又長

<sup>56</sup> 〈史料編纂に關する持地編纂部長の演述〉，《臺灣時報》，第37號（1922年8月），頁23-26，並參考頁140-141之漢譯文。

<sup>57</sup> 〈新臺灣史の目錄草稿〉，《臺灣時報》，第37號（1922年8月），頁116-117。

期擔任東大史料編纂官，此次再度被徵聘為囑託，應是總督府有意借重其經驗與專長。只可惜在伊澤多喜男總督上任後，「新臺灣史」的編纂工作因總督府編制大幅縮減而停止。

中斷四年的修史事業，在1929年4月，川村竹治總督以訓令第29號「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規程」重新復活。此次編纂委員會由曾經參與前次編纂事業之臺北帝大南洋史學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擔任部長，編纂員有臺北帝大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久保得二、助教授神田喜一郎、臺北高等學校教授波多野清太郎，以及猪口安喜、尾崎秀眞、鹽見平之助等囑託。編纂方略，分為領臺前、領臺後。領臺前之史料雜纂部分又分日本、西洋及支那三部分，日本與西洋由村上擔任，中國部分則由久保負責。至於領臺後的部分，既有陸軍刊行，尚有總督府保存之如山積之古文書。體裁一改「新臺灣史」體例，改以仿效《大日本史料》之編年史風格。這樣的轉變應該和部長村上有絕大關係，村上曾經擔任東大史料編纂官，參與《大日本史料》之編纂，將其經驗移植至臺灣，實乃順理成章。《臺灣日日新報》對此次的編纂委員會寄予期待，但對《大日本史料》花費五十年以上時間，而臺灣之史料編纂能否三年完成，提出質疑。<sup>58</sup>

此次編纂工作雖然預算大幅縮減為2,000圓，但在村上的領導下，仍然順利完成。具體成績包括：改隸前之臺灣史料部分有：村上自巴達維亞城日誌抄譯之日本、臺灣部分；久保、神田自中國、臺灣有關史志典籍，拔錄出臺灣關係史料。改隸後之臺灣史料有：尾崎、猪口、鹽見等囑託，依日清戰史、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總督府公文類纂、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平臺紀念錄、治匪誌，以及其他公文書、報紙雜誌，編製明治28年至大正8年之日誌長編。總計《臺灣史料》稿本本編27冊、綱文25冊；《臺灣史料雜纂》7冊：包括第一卷1冊、第二卷《巴達維亞城日誌》3冊、第三卷《柯爾尼里斯·賴耶魯仙司令官日記》1冊、第四卷《改隸前支那史料（清代及其以前之中國史料）》2冊，合計59冊，製成3套，分別

<sup>58</sup> 〈陣容漸く整へる臺灣史編纂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0462號（七），1929年6月4日。

保存。<sup>59</sup> 目前這三套《臺灣史料》稿本，一套藏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一套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有殘缺），另一套據說是藏於日本京都大學。<sup>60</sup>

其中，《巴達維亞城日誌》3冊、《史料雜纂》第一卷1冊、《柯爾尼里斯·賴耶魯仙司令官日記》1冊等，係有關荷西時期的史料，由村上直次郎負責翻譯、編輯。《巴達維亞城日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收藏在雅加達的印尼國立檔案館（Arsip Negara, Djakarta），即戰前巴達維亞地方檔案館，村上將《巴達維亞城日誌》中有關臺灣和日本的記事摘抄翻譯部分，收於《史料雜纂》第二卷《巴達維亞城日誌》3冊中。1937年，由東京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刊行了上、中卷（參看表1編號21、22）。1970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重譯成中文印行。<sup>61</sup> 後來，這套日譯本又經村上高足中村孝志增補詳細的註釋和附錄，並整理未刊行的下卷，文後又附索引，於1970年至1975年由東京平凡社重新出版（參看表1編號23、24、25）。新的校注本第二冊附錄中，收有村上在編修《史料雜纂》第一卷時所翻譯的西班牙占據基隆的相關資料、臺灣長官 Paulus Tradenius給Henrick Harrousee的攻略基隆的西班牙駐軍的指令、Harrousee的攻略報文、荷西的協定等荷蘭驅逐基隆西班牙勢力的資料、荷蘭在臺灣的傳教資料、Combes書中所收錄的鄭成功諭呂宋書等珍貴的荷、西史料。另外，新的校注本第三冊附錄收有《史料雜纂》第一卷中有關「1650年臺灣戶口調查表」的荷蘭文檔案的日譯等史料。1990年，臺灣省文獻會委員程大學將之翻譯成中文刊行。<sup>62</sup> 而《柯爾尼里斯·賴耶魯仙司令官日記》係W. P. Groeneveldt所撰《在中國的荷蘭人；第一部：1601-1624年間在中國求市之初次紛擾與澎湖的占據（De-Nederlanders

<sup>59</sup> 井出季太和：《臺灣治績志》（東京：青史社復刻，1988年），頁780。

<sup>60</sup> 吳密察：〈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頁51。

<sup>61</sup> 村上直次郎日譯、郭輝中譯，王詩琅、王世慶校訂：《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

<sup>62</sup> 村上直次郎日譯、中村孝志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年）。

in China Istestuk : De eerst bemoeiingen om der handle in China en de vestiging in de Pescadores, 1601-1624)》一書裡所收的附錄中，1622年4月10日至1623年9月4日間Reijersen的日記，和他的1622年4月11日至1623年9月23日間的決議錄，以及Sonck的決議錄、1624年11月5日Sonck呈給巴達維亞總督Coen的報告、信件等，內容為荷蘭人初來占據澎湖，撤退轉移至大員這一段時期的主要荷蘭檔案。<sup>63</sup>

### 三、與臺灣有關之研究與譯注

村上直次郎以九十八歲高壽辭世，著作等身，無法一一詳加介紹，茲列舉與臺灣有關之研究與譯著如下：

表1：村上直次郎與臺灣有關之研究、譯著一覽表

編號	題 目	發 表	時 間
1	臺灣新港社文書	《史學雜誌》8:7	1897年7月
2	寬永鎖國以前の海外貿易	《臺灣教育》261號	1924年3月
3	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	《臺灣文化史說》	1930年10月
4	蘭人の蕃社教化	《臺灣文化史說》	1930年10月
5	臺灣蕃語文書	《臺灣文化史說》	1930年10月
6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に就いて	《臺灣時報》132號	1930年11月
7	臺灣蕃語文書の研究	《臺灣教育》343號	1931年2月
8	基隆の紅毛城址	《臺灣時報》144號	1931年11月
9	蘭人臺灣占據の目的	全國中等學校地理歷史科教員第九回協議會及臺灣南支旅行報告	1932年4月
10	澎湖島に於けるオランダ人	《臺灣時報》158號	1933年1月
11	Sinkan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輯第一號	1933年4月
12	基隆港の史蹟に就て (演講筆記印刷出版物)	《基隆港灣會刊》	1933年6月
13	臺灣屈指の史蹟—「基隆の今昔」について	《臺灣日日新報報》11944、11945、11946號	1933年7月7、8、9日
14	總督府博物館の女人木像に就いて	《科學の臺灣》2:1	1934年1月
15	ジャガタラの日本人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	1934年5月

<sup>63</sup> 參考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望〉，頁19-22。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297-300。



編號	題目	發表	時間
16	オランダ史料に現はれたる山田長政	《臺北帝國大學記念講演集》第三輯	1934年10月
17	イスパニアの臺灣占據	《科學の臺灣》2:5、6	1934年12月
18	ジャガタラの日本人 補遺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二輯	1935年6月
19	鄭氏以前の臺灣	《東洋》臺灣特輯號	1935年9月
20	史蹟調査報告第二輯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1936年11月
21	抄譯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上卷	東京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	1937年1月
22	抄譯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中卷	東京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	1937年7月
23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1	東京平凡社	1970年9月
24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2	東京平凡社	1972年2月
25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	東京平凡社	1975年5月

附註：此表係依據柳谷武夫編：〈村上博士著作目錄抄〉，《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會會報》，九ノ四。轉載於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上智史學》，No.13（1968年10月），頁3-6，增刪而成。

按照文章的性質大致可分三類：（一）與「新港文書」之研究有關者，亦即編號1、5、7、11，其內容已於上述之肆之一介紹，此處不再重複；（二）南洋史之研究，編號2、15、16、18；（三）十六、七世紀臺灣史之研究與譯注，此類數目最多。但因年代久遠，史料散佚，編號9、12兩篇未曾親見。其中編號12，據筆者推斷，應為村上於臺北帝大史學科「歷史讀書會」第18回「基隆社寮島史蹟見學」之講稿筆記，內容應與刊載在《臺灣日日新報》編號13的內容類似。編號21、22、23、24、25，亦即村上針對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成果《臺灣史料雜纂》第二卷《巴達維亞城日誌》3冊之校注、翻譯。

編號3〈熱蘭遮城築城始末〉一文，詳述荷蘭人希望與中國通商，因此積極尋找港灣、築城，以作為通商據點的始末。一開始拉伊爾（Reyersen）先在澎湖島築城，後來中國官員要求荷蘭人離開澎湖，1622年拉伊爾遂轉至大員島建臨時性城砦，1624年荷蘭首任臺灣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重建為城堡，此即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根據地。此城堡初名奧倫治城，1627年連同普羅民遮市街一起易名為熱蘭遮，其後幾任的臺灣長官又多次修整、加築、擴建。1662年，鄭成功

收復熱蘭遮城後，改稱安平鎮。1683年，施琅攻滅鄭氏，將臺灣收歸清朝版圖後，清廷在今臺南市區建臺灣府和臺灣縣衙門，安平城已不如以往重要，遂逐漸荒廢。<sup>64</sup>

編號4：〈蘭人的番社教化〉一文，敘述荷蘭人對臺南一帶平埔族人懷柔、教化的過程。拉伊爾在大員島上築城時，新港社人已承諾可免費砍伐社內的竹子，築城過程中新港社還有鄰社許多番人亦前來幫忙，後來目加溜灣社約200人在漢人移民的煽動下，攜弓槍突然來襲，荷蘭人由於人少勢寡，遂撤至大員島，而和番人的來往也暫時中斷。宋克自澎湖撤至大員島後，新港、蕭壟兩社的番人再度要求往來，而目加溜灣社人也透過他們為之前的偷襲道歉，宋克為了對番人懷柔也赦免了目加溜灣社人。後來，麻豆社人也前來要求互相交誼。因此，為了和這些番人更為親近，認為有必要讓年輕的東印度公司職員學習當地土語。1629年，牧師Candidus、Junius開始向新港社人傳教、開辦學校，教授新港語並施予宗教上的教育。然而荷蘭人在持續擴張勢力，大力的教化番人時，卻也面臨意想不到的障礙。首先是和日本商人的衝突，之後是番社人心的叛離，不得已只得先進行討伐、懲罰。直到1636年，北方目加溜灣社、麻豆社、蕭壟社、諸羅山、哆囉國（二社）、芝舞蘭、大目降等7社和南方大小放索等10社和新港社，合計28社的重要人物都集合在新港社，向荷蘭長官Putmans宣誓服從。此後，荷蘭人又陸續在這些番社開辦學校，傳播基督教教義。荷蘭人在臺約四十年，認真從事教化番人的時間不過三十年，儘管當時的效果不錯，但無法冀望能夠永久流傳。一時皈依基督教的番人也尚未完全被同化，因此荷蘭人離開後依然信教的人，只剩在新港社及其附近番社中的少數而已。<sup>65</sup>

<sup>64</sup> 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臺灣文化史說》（臺南：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會，1930年），頁33-92。村上直次郎著、石萬壽譯：〈熱蘭遮城築城始末〉，《臺灣文獻》，26：3（1975年9月），頁112-125。

<sup>65</sup> 村上直次郎：〈蘭人の蕃社教化〉，《臺灣文化史說》，頁93-120。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譯：〈蘭人的蕃社教化〉，《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6：5（2000

編號8、13與17是介紹西班牙人占據基隆、淡水的經過，以及紅毛城址之興建沿革及其概況。馬尼拉政廳聽到荷蘭人於1624年占據大員之後，深切的體認到占領臺灣之必要，於是在1626年春，決定派遠征軍到臺灣，抵達三貂角（Santiago）海灣後，又發現基隆港，將之命名為La Santisima Trinidad（至聖三位一體），全部艦隊在此處入港。占領基隆之後，馬尼拉政廳對港口寄望甚殷，因感於有防備荷蘭人來襲之必要，於是用心加強防備，築了San Salvador城，又於社寮島之東部與海相接之處和八尺門水道最狹窄處，築造堡壘。1628年又占領淡水，再築一城，命名為San Domingo。西班牙人之占據基隆，對於在大員的荷蘭人是一個重大問題。諸番社漸次歸順後，1641年起率領艦隊開往基隆，在巴達維亞城派兵協助下，終於在1642年8月，順利趕走西班牙人。荷蘭人保留了西班牙人所築的城堡，接收後重新命名，在海牙文書館內藏有1654年完成之臺灣北部著色圖。此外，社寮島之蕃字洞，村上於1896年第一次前往調查時，在洞穴裡側之牆上可清晰讀出Nicolaws Gros Anno Christi 1661等荷蘭人名及年號，但在1905年石板莊作拍攝照片時，已有部分文字磨滅或全看不見。紅毛城之部分地基仍存於社寮島之西南端，Reduijt burgh堡之位置已確認是在渡口附近，山上尚有堡壘的廢址。村上認為，上述之舊址與蕃字洞應一併妥為保存，以作為西、荷兩國占據北臺灣之歷史見證。<sup>66</sup>

編號14：〈關於總督府博物館的女人木像〉一文，係針對總督府博物館（今二二八公園之國立臺灣博物館）藏之女人木像所寫的短文，此一

---

年9月），頁86-94。收入氏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頁23-39。

<sup>66</sup>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臺灣時報》，第144號（1931年11月），頁13-22。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譯：〈基隆的紅毛城址〉，《臺北文獻》，直字第117期（1996年9月），頁127-138；收入氏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頁41-57。村上直次郎：〈臺灣屈指の史蹟—「基隆の今昔」について〉，（一）（二）（三），《臺灣日日新報》，第11944號（6）、第11945號（6）、第11946號（6），1933年7月7、8、9日。村上直次郎：〈イスパニアの臺灣占據〉，《科學の臺灣》，2：5、6（1934年12月），頁7-8。

女人木像高約127.5公分，腹部與腳邊略有損毀，於淡水附近海岸發現。當時西洋的帆船習慣於船首設置半身或全身雕像，根據村上的考訂，1842年3月曾有英國船隻Ann於淡水外海遭遇風浪，沉沒海中，此一女人木像似乎即是此船之遺物。<sup>67</sup> 1935年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四十週年，《東洋》雜誌特編輯「臺灣特輯號」，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撰文。編號19〈鄭氏以前的臺灣〉，是村上概述荷、西時期臺灣歷史的文章，內容與前述各篇雷同，此處不再重複。<sup>68</sup> 編號20為臺灣總督府天然史蹟調查的成果報告，第一輯全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相關史蹟；第二輯則包括荷、西、清、日治時期之重要史蹟，由村上負責撰寫芝山巖、熱蘭遮城等史蹟之概況報告。<sup>69</sup>

## 伍、結 論

村上直次郎出生於明治元年，歷經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是日本進入近代化、文明開化的年代。村上進入東大史學科就讀，得以向坪井九馬三和Ludwig Riess問學，奠定他日後從事實證史學研究的基礎。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新領地，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臺灣成為一些日本學者進行知識探求的學術實踐場域。村上因其西文能力優異，遂能從事難度較高的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史的調查、研究與撰述。

1928年，為配合日本南進政策的推動，臺灣總督府成立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之設置，即為研究、教授以臺灣為中心之華南、南洋史學。村上出任講座教授，不僅教學嚴謹、紮實，研究成果亦頗為豐碩。繼任之岩生成一、箭內健次，亦遵循村上腳步，兢兢業業。

<sup>67</sup> 村上直次郎：〈總督府博物館の女人木像に就いて〉，《科學の臺灣》，2：1（1934年1月），頁2-3。

<sup>68</sup> 村上直次郎：〈鄭氏以前の臺灣〉，《東洋》，臺灣特輯號（1935年9月），頁46-57。

<sup>69</sup> 村上直次郎等：《史蹟調查報告》，第2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6年）。

岩生對於臺灣的研究，在荷治以前有豐臣秀吉、有馬晴信、村山等安等人的侵占臺灣之研究外；荷治時期有〈三百年前臺灣砂糖與茶的輸出波斯〉、〈在臺灣的初期日本移民〉等研究，特別是〈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一文，考訂鄭芝龍之故主究竟是顏思齊或李旦，更是引發學界討論。<sup>70</sup>1941年4月，岩生更以《南洋日本町の研究》<sup>71</sup>一書，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獎。而箭內則以西班牙文獻進行菲律賓史的研究，頗有成果。畢業生中，亦有中村孝志，終生理首於荷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為臺灣學者中研究荷西時期臺灣史成果最為豐碩者，曹氏係岩生成一的高足，與中村孝志交往甚密，亦可以算得上是村上直次郎的再傳學生。

村上一生的學術成果極為豐富，十六、七世紀的臺灣史研究、南洋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這一小部分的著述，是臺灣歷史學重要的資產。他精通多國語文，從事廣泛史料蒐集，實地調查有關史蹟，進行嚴謹而有系統的撰述，都是歷史學者應有的才識，對於近代臺灣歷史學可謂貢獻良多，也給有志於史學研究者不少的啟示。

---

<sup>70</sup> 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望〉，頁38；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319。

<sup>71</sup> 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南亞文化研究所，1940年）。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乙種永久進退追加第341冊，第51號文書，〈歷史編纂事務囑託村上直次郎用濟ニ付囑託ヲ解ク〉。

第3454冊，第1號文書，〈持地六三郎（府史編纂事務囑託）〉。

第3454冊，第2號文書，〈田原禎次郎（社會事業調查及府史編纂事務囑託）〉。

第3454冊，第3號文書，〈尾崎秀眞（府史編纂事務囑託）〉。

第3454冊，第7號文書，〈持地六三郎（府史編纂委員會部長ヲ命ス）〉。

第3750冊，第51號文書，〈田原禎次郎（賞與；危篤）〉。

第3752冊，第38號文書，〈村上直次郎（府史料編纂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

第3752冊，第65號文書，〈持地六三郎（賞與；危篤）〉。

第10051冊，第21號文書，〈村上直次郎（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俸給）〉。

第10051冊，第57號文書，〈村上直次郎（自今內地滯在中加俸本俸ノ十分ノ三ヲ給ス）〉。

第10056冊，第50號文書，〈村上直次郎（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部長ヲ命ス）〉。

第10056冊，第59號文書，〈神田喜一郎（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員ヲ命ス）〉。

第10056冊，第104號文書，〈波多野清太郎（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員ヲ命ス）〉。

- 第10057冊，第17號文書，〈藤田豐八（賞與；危篤）〉。
- 第10057冊，第92號文書，〈村上直次郎（補文政學部長；職務俸）〉。
- 第10058冊，第40號文書，〈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大助教授；俸給；勤務）〉。
- 第10059冊，第73號文書，〈小川尙義（任臺北帝大教授；俸給；勤務）〉。
- 第10070冊，第128號文書，〈村上直次郎（解補文政學部長講座分擔職務俸二百円下賜）〉。
- 第10083冊，第123號文書，〈村上直次郎（年功加俸六百円下賜；退官；賞與）〉。
- 第10085冊，第110號文書，〈小川尙義（三級俸下賜；賞與；依願免本官）〉。
- 第10085冊，第134號文書，〈岩生成一（任臺北帝大教授；叙高等官五等；本俸十二級俸下賜；文政學部勤務ヲ命ス；南洋史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九百九十圓下賜）〉。
- 第10093冊，第182號文書，〈箭內健次（任臺北帝大助教授；七等十二級；文政學部勤務；職務俸三百六十円）〉。
- 第10221冊，第57號文書，〈久保得二（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員ヲ命ス）〉。

## （二）期刊、報紙

《東洋》，1935年。

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一覽》，1942年。

《科學の臺灣》，1934年。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二、三、六輯。

臺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1932年、1935年。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929年、1933年。

《臺灣時報》，1922年、1923年、1924年、1925年、1929年、1931年。

### (三) 專書

村上直次郎日譯、郭輝中譯，王詩琅、王世慶校訂：《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

村上直次郎日譯、中村孝志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年。

松本巍著、蒯通林譯：《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臺北：蒯通林，1960年。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

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

井出季太和：《臺灣治績志》。東京：青史社復刻，1988年。

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東京：富三房，1898年。

村上直次郎等：《史蹟調查報告》，第2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6年。

村上直次郎譯、柳谷武夫編輯：《イエズス會士日本通信》，上、下。東京：雄松堂，1969年。

村上直次郎譯、柳谷武夫編輯：《イエズス會日本年報》，上、下。東京：雄松堂，1969年。

村上直次郎譯、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3。東京：平凡社，1975年5月。

岩生成一：《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

檜山幸夫：《臺灣史料綱文》，下卷。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史料研究會，1989年3月。

Naojirō Murakami, Sinkan Manuscripts,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I, No. 1 (Formosa: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1933) .



#### (四) 期刊論文

-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
- 村上直次郎著、石萬壽譯：〈熱蘭遮城築城始末〉，《臺灣文獻》，26：3（1975年9月）。
- 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譯：〈基隆的紅毛城址〉，《臺北文獻》，直字第117期（1996年9月）。
- 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譯：〈蘭人的蕃社教化〉，《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6：5（2000年9月）。
- 李壬癸：〈一百年來平埔族語言消失的歷程〉，《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 李壬癸：〈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臺灣史研究》，9：2（2002年12月）。
- 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年。
-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年12月。
- 吳密察：〈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
- 吳國聖、翁佳音：〈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建構西拉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2005年12月。
- 林秀美：〈臺北帝國大學之創設〉，《臺北帝大的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年。
- 翁佳音：〈一件單語新港文書的試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9年。

- 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望〉，《臺灣風物》，28：1（1978年3月）。
-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
- むな生：〈梗概及評論：臺灣島史〉，《史學雜誌》，8：6（1897年6月）。
- 加藤繁、松田壽南：〈彙報：藤田博士逝く〉，《史學雜誌》，40：4（1929年8月）。
- 西村朝日太郎：〈學界のヨブ・馬淵東一外傳〉，《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 社會人類學の諸問題》。東京：地一書房，1986年。
- 村上直次郎：〈臺灣新港社文書〉，《史學雜誌》，8：7（1897年7月）。
- 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臺灣文化史說》。臺南：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會，1930年。
- 村上直次郎：〈蘭人の蕃社教化〉，《臺灣文化史說》。臺南：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會，1930年。
- 村上直次郎：〈臺灣蕃語文書〉，《臺灣文化史說》。臺南：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會，1930年。
- 佐藤直助：〈村上直次郎先生を追憶して〉，《上智史學》，No.13（1968年10月）。
- 岩生成一等：〈先學を語る 村上直次郎博士〉，《東方學》，第57輯（1979年1月）。
- 金井圓：〈岩生成一先生を偲ぶ〉，《史學雜誌》，97：6（1988年6月）。
- 馬淵東一：〈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馬淵東一著作集》，第3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1974年。
- 箭內健次：〈近世の外交〉，《新講大日本史第9卷 日本外交史》。東

京：雄山閣，1941年。

〈彙報：村上直次郎氏の臺灣及南支那旅行〉，《史學雜誌》，8：4  
（1897年4月）。

〈彙報：臺灣島史の行衛〉，《史學雜誌》，11：1（1900年1月）。

〈彙報：國史大學院例會〉，《史學雜誌》，47：8（1936年8月）。